

王充和《问孔》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王充和《问孔》

本社编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四年·太原

王充和《问孔》

本社 编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(太原并州路七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3\frac{1}{2}$ 字数: 77千字

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,000册

书号: 11088·32 定价: 0.23元

毛主席语录

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，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，研究中国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和文化，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，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。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。

目 录

论王充的反儒斗争·····	钟 达 (1)
王充的《论衡·问孔》篇·····	(10)
王充的《论衡·刺孟》篇·····	(14)
问孔·····	〔汉〕王 充 (18)
《问孔》译文·····	(45)
刺孟·····	〔汉〕王 充 (67)
《刺孟》译文·····	(78)
王充传·····	陆晓松 (91)

论王充的反儒斗争

钟 达

王充是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者，是公开举起“伐孔”、“刺孟”的战斗旗帜的进步思想家。

王充所处的时代，是孔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时代。

西汉王朝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，它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路线，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都是尊法的。到了西汉末期，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，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。世家豪族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土地大量兼并和集中，农民被迫流离失所。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，激起农民的反抗，到处举起起义的火把。地主阶级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吓破了胆，他们一面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，一面乞灵于孔孟之道，大肆提倡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孔孟儒学，主要是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，作为麻痹、瓦解广大农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武器。从汉元帝刘奭开始，儒家思想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占了统治地位。汉光武帝刘秀依靠世家豪族残酷镇压了绿林、赤眉起义，建立东汉政权以后，对儒学更加大力提倡，竭力宣扬被称为“图讖”的神怪预言。谁对孔丘和儒家那一套反动迷信的东西稍有怀疑和不敬，就要被扣上“非圣无法”的罪名，有丢掉脑袋的危险。公元七十九年，汉章帝刘炟亲自主持了大规模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，把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加以条理化，儒学的地

位也提得更高。

面对这股独尊儒术的逆流，王充挺身而出，不怕讥笑，不怕迫害，写出了《论衡》一书，把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祖师爷孔丘，提出：“追难孔子，何伤于义”？“伐孔子之说，何逆于理”？表现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勇敢战斗精神。

在《论衡》一书中，最有光彩的篇章是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。在这里，王充以孔丘、孟轲的代表作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靶子，从他们的言行中找出“相违”、“相伐”的大量事实，运用形式逻辑，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。

孔丘不是宣扬“仁义”吗？他口口声声说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但是，却很想到佛肸和公山弗扰那里去做官。子路问他，你不是说“亲身做坏事的人，君子不去他那里”吗？他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，一会说是想实行他的政治主张，一会又赤裸裸地宣称，我不是瓠瓜，不能挂着不吃。王充指出，孔丘讲话没有准，办事也不会有准。他把自己比做瓠瓜，说瓠瓜不吃饭可以，我不吃饭不行，为了吃饭，为了富贵，“何其鄙也”，他同公山弗扰、佛肸等坏人勾勾搭搭，又“何其浊也”。在这里，王充提出了问题，但没有看出孔丘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。实际情况是，公山弗扰和佛肸，当时都是企图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叛乱分子，孔丘想到他们那里去做官，乃是为了搞垮鲁国和晋国的革新势力，实现其“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”的野心。孔丘这个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，对于革新势力是恨之入骨的。涉及到政治问题，他就完全抛掉“仁义”的伪装。以宰予昼寝为例。宰予打瞌睡本来是一件小事，孔丘却摆出一副恶霸脸孔，大

骂宰予是“不可雕”的“朽木”，是“粪土之墙”。王充认为，宰予犯了打瞌睡这样的“小过”，孔丘把他比做不堪造就的朽木粪土，是小题大做了，不足以服人。实际上，孔丘骂宰予是事出有因的，是因为宰予政治上同他有分歧，不同意他的政治主张。

孔丘不是宣扬“礼”吗？他的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了，他哭得好象很伤心。可是，当颜渊的父亲请求孔丘把车子卖掉给颜渊买口外棺的时候，孔丘却马上板起面孔，一口拒绝，说什么“大夫出门不能步行”。还对别人说：“我儿子死也没有给他买外棺。”王充指出，孔丘为了保持大夫身分，不肯卖掉车子为学生和儿子买槨，是贪恋官位，爱摆架子。他质问孔丘：你说“君子杀身以成仁”，为什么不能放弃爵位来坚持“礼”呢？在这里，王充尖锐地揭露了孔老二言行不一及其所宣扬的“礼”的虚伪性。但是，他没有从政治上看到“礼”的反动本质。事实上，孔丘的“礼”是为政治服务的，他鼓吹“复礼”，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。

孔丘不是宣扬“信”吗？其实他的假话是说得最多的。孔丘曾经叫嚷要跑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。王充就质问他，你的政治主张在中原还行不通，在中原以外的地方怎么能行得通呢？你不是说，那里的事情比中原更难办吗？好办的地方都行不通，难办的地方就行得通吗？王充正确地指出：孔丘并不是真的想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，而是有意撒谎。他骂别人是强嘴利舌的“佞者”，其实他自己正是一个言行不一的“佞者”，一个伪君子。说假话，这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共同特点。他们为了实现其反动政治主张，总是嘴上说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。孟轲就曾经说过：“大人者，言不

必信，行不必果。”叛徒、卖国贼林彪也说：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。”这恰巧反映了这些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的腐朽性和虚弱性。

王充是反儒斗争的战士。他虽然没有从路线上批判孔丘的反动本质，但是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能这样大胆地指着孔丘鼻子，骂他又鄙、又浊、又贪、又佞，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。这种尖锐的批判，一直激励着后来进步的思想家的批孔斗争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是深远的。

在《刺孟》篇里，王充对孔丘的继承者孟轲所宣扬的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的反动观点的批判，是很有光彩的。孔轲说：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，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。王充认为，孟轲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。帝誉、尧、舜、禹都是“王者”，他们是“继踵而兴”的，没有隔五百年；由周到孟轲已经过了七百年，也没有兴起“王者”。五百年是上天生“圣人”的期限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到了期限，上天为什么不准时生一个“圣王”呢？王充指出，孟轲满怀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”的政治野心，由于没有掌握到政治权力而“怀恨”，所以尽说些经不起事实考验的骗人的“浮淫之语”。王充批驳孟轲所发挥的这些思想，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。作为封建社会的先进思想家，王充主张革新，反对倒退，因此他敢于向儒家的“天才论”宣战。修正主义的头子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，亦步亦趋地跟在孟轲之后，叫嚷“天才”几百年、几千年才出现一个，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自己。他这种反动观点，正是王充在一千九百年以前在批判孟轲时就驳斥过了的。当然，王充还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来彻底地批判这种反动

的“天才论”，这个任务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。

王充的《论衡》，有力地驳斥了孔孟天命论在汉代的翻版——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。

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，把天说成有目的、有意志的最高主宰，把世间万事万物说成是天有意识地创造和加以安排的。人如果顺应天的意志，天就降福，否则就降祸。他还炮制了“君权神授说”，宣扬“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”，谁反对皇帝就是逆天，假借“天意”来肯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。

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，吸收了汉代天文学和医学的成果，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些谬论。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形成的，天和地一样是没有感觉、目的和意志的物质实体。“天道，自然也，无为”（《谴告》），世界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的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和安排世界的最高主宰。“人不能以行感天，天亦不随行而应人”（《明雩》），孔丘和儒家的经典动不动就讲天命，其实只是吓唬和愚弄人民罢了。这样，王充就继承和发挥了荀况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的唯物主义观点，有力地冲击了君权神授的基础。王充还针对儒家提出的天能降祸降福以及自然灾害是上天对人君的“谴告”的观点，考察了当时所谓灾异，如日月食、地震、雷雨等，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，绝不是上天的“谴告”。他认为，儒家编造的“谴告”是和“礼”一起搞出来的。上古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“谴告”。只有“末世衰微，上下相非，灾疑时至”，即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、矛盾重重，灾异很多的情况下，才“造谴告之言”。所以他说：“谴告之言，衰乱之语也”。（《自然》）就是

说，“谴告”的出现，反映了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加深。王充虽然没有揭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“谴告”转移人民斗争视线、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阶级本质，但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，指出它是同政治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，在当时，这也是很高明的见解。

王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唯物主义者，他坚决宣传无神论，反对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。他提出了关于形体和精神关系的著名论断：“天下无独燃之火，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？”（《论死》）他指出精神是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，从而否定了一切鬼神的存在，这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的有力批判。他的战斗成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王充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，如范缜、吕才、张载、王夫之，都受过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。

坚持法家主张革新、前进的观点，反对儒家“好高古而下今，贵所闻而贱所见”的历史倒退论，也是王充《论衡》一书的鲜明特点。

董仲舒叫嚣“奉天而法古”，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大肆鼓吹“今不如昔”的谬论。他诋毁汉朝由于继承了秦的法治而腐败得象朽木泥墙一样，无法修补，只有推行孔孟之道即开历史倒车是唯一的出路。王充是肯定商鞅的耕战政策的，认为它取得了“为秦开帝业”的重大成果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秦王朝的进步作用。他指出，怀有今不如昔、汉不如周的成见的俗儒，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，越古越好，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。在《宣汉》、《恢国》等篇中，王充高度评价刘邦打败项羽分裂势力、建立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成就，对汉朝的建立和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、

打击分裂割据势力的措施作了充分的肯定，他认为，“秦汉之际，功奇行殊”（《齐世》），但被儒家贬低和轻视了。他从各方面把汉代和周代作了比较，指出汉代国土的开辟远远超过了周代；在生产力提高方面，周代的荒野地区到汉代已有很多开成肥沃的田地；汉代在精神文化上也比周代发达。一切都证明“汉高于周”，汉“在百代之上”。他还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发展，举出古代的人吃不上五谷，也没有衣服穿，现在却“穿地为井，耕土种谷”，“有布帛之饰”等事实（《齐世》），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，驳斥了“今不如昔”的谬论。他嘲笑儒家说，你们“上则求虞夏，下则索殷周”（《齐世》），对古代的东西津津乐道，但对于当代的成就却反而全不看在眼里，“知古不知今”，简直是昏昧透顶！儒家说“汉不及周”，鼓吹一代不如一代，是十足的反动的历史倒退论。王充肯定“汉高于周”，汉“在百代之上”，则坚持一代胜过一代，继承了法家的反复古主义的传统。

王充的反儒斗争，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的。这场斗争，实质上是先秦以来的儒法之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。但是，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，王充反对儒家的斗争是不彻底的。他在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等篇中，对孔孟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，主要是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，揭露孔孟言行的矛盾、言论和事实的矛盾及言论本身的矛盾，没有抓住路线问题。在《非韩》篇中，王充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态度显然和对待儒家的态度不同，但是对韩非的政治主张的评价是不正确的。他指责韩非只讲耕战，不讲礼义；只讲刑，不讲德，认为儒者是代表礼义的，不可缺少，不同意韩非关于儒

居于“五蠹”之首的观点。这恰恰暴露了他不能从路线上分析问题。在讲到秦统一六国时，他也没有抓路线问题，只说是“秦以兵强，威无不胜”。至于秦为什么强，他就说不上来了。

为什么王充会写出《非韩》篇呢？

第一，他没有看清法家和儒家是互相对立的政治力量，没有把儒法斗争看成路线斗争。法治还是礼治，这是从先秦到西汉儒法斗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，其实质就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，还是复辟奴隶制。“复礼”是奴隶制复辟势力抛出来的反革命政治纲领，而“明法”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制的战斗口号。韩非认为“法”是最高的原则，他说：

“令者，言最贵者也；法者，事最适者也。言无二贵，法不两适”（《韩非子·问辩》），而斥儒家的“礼”是“乱之首”（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），观点十分鲜明。王充却企图把这两个对立面调和起来，把它们说成是相辅相成、不可偏废的，因而指责韩非“废德”“任刑”是走偏了方向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王充比起韩非来，就后退了。

第二，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思想影响。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，地主阶级和奴隶制残余势力日益走向妥协，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起义。这时，儒家也将“礼治”改头换面，打扮成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“德治”，以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。他们吹嘘“德治”，说什么“汉德宽厚，民无二心”，强调“德治”有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和欺骗人民的作用。这一转变对东汉前期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桓谭、王符等人发生了影响，对王充也不例外。尽管王充曾反驳过儒家关于“德治”的吹牛，

指责孔老二要人民饿着肚皮谈礼义，但是，他还是受到了“德治”的观点的影响，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待历史上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礼治的争论，结果竟得出了与他自己的反儒斗争精神相矛盾的结论。

历史经验表明，儒法斗争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。反儒，而不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，不从儒家的阶级本质上批判他们的政治主张，不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，是不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的。而这正是为什么王充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儒家的战斗旗帜，但反儒不彻底的关键所在。这个彻底批判儒家思想的历史任务，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。毛主席指出：“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，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。”我们用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，并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联系起来，就有可能完成过去一切时代的先进思想家们所不能完成的任务。

（原载《红旗》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八期）

王充的《论衡·问孔》篇

王充（约公元二七——九七年），字仲任，上虞（今浙江上虞县）人，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，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。他出身平民家庭，做过地方官吏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较贫苦的环境中从事著述。

在王充生活的时代，反动儒学占据了独尊地位。西汉从元帝以后就已经弃法尊儒。西汉晚年，社会危机加深，统治者越发向天神求助，于是，在反动儒家董仲舒那套封建神学基础上，宣扬宗教迷信的“谶（chèn音衬）纬之学”泛滥开来。靠镇压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东汉政权，为了巩固封建秩序，便由皇帝召开讨论经学的“白虎观会议”，以法律形式把孔孟之道定为正统思想。他们奉孔丘为通天的神明，使儒学更加神秘化、宗教化，谁要反对，就有杀身之祸。因此，整个思想领域充斥着一片恶浊的空气。

正当尊儒逆流横行之际，王充继承法家进步传统，以勇敢的反潮流精神大造孔孟之道的反，全面批判当时的官方哲学，向谶纬迷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《论衡》，就是他的一部反尊孔斗争的重要著作。历代反动派都把这部著作视为“异端”、“邪说”，咒骂王充非圣灭道，是首倡不畏天变，不信诗书，不法先王之政的“小人”。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，《论衡》在儒法斗争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，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《论衡》共八十五篇，《问孔》是其中的第二十八篇。在《问孔》这篇光辉著作中，王充对《论语》所记孔丘的许多言行，都以唯物主义的精神和扫荡一切虚妄的态度，进行了剖析。他善于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揭露其中自身的矛盾，把矛头集中地指向孔丘其人和孔孟之道，向反动儒家公开宣战。

复古与反复古，尊孔与反尊孔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。从来的保守势力和反动派都鼓吹孔丘“信而好古”的教条，而复古必定提倡尊孔读经。东汉的大地主阶级就是这么作的。但王充却要求变古，变古则反旧传统，反“权威”，非圣非经。在《问孔》篇开头，王充猛烈抨击了当时复古思潮中的腐败现象：那些庸俗儒生们，“总喜欢迷信老师、崇拜古人，以为圣贤说的话全没有错，专心致志地讲述学习，却不知道提出辩驳和疑问。”王充大胆地质问说：孔丘“匆忙之中说的话，怎能都对呢？”其实，考察孔丘的言论，“上下多相违，其文前后多相伐（抵触）者。”王充进而义正辞严地宣告：“追难（反驳）孔子，何伤于义！”“伐（批判）孔子说，何逆于理！”英勇地树起了批孔的大旗。

《问孔》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，是儒家的天命论。董仲舒炮制的“天人感应”论，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，皇帝是天派来统治人民的，人们要服从天和皇帝，如果顺应天的意志，天就降福，不然就会降祸。王充以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，批判了这种谰言。他穷本追源，朝着董仲舒的祖师爷孔丘开刀。例如，孔丘见子路怀疑自己与南子有淫乱关系，便指天发誓：“我要是干了卑鄙的事，老天爷让我死！”王充尖锐指出：“世间根本没见过被天惩罚处死

的人。拿这种不是实有的事赌咒发誓，子路怎么会谅解呢？”从而否定了天能“赏善罚恶”的鬼话，戳穿了孔丘和董仲舒的骗人哲学。又如，孔孟之流胡说什么上天能向人世作出表示：天下太平，凤凰就飞来了；圣人受命，黄河就出现图画，等等。王充严加驳斥说：请问，所谓凤鸟至河出图是祥瑞的征象，根据是什么？如果说太平之世有的话，可是“太平之帝，未必常至凤鸟与河图也。”王充指出，太平之世，凤鸟并非必然之应。他认为，国家兴衰决定于人事。“任贤使能”才能“治定功成”，这是治国的根本。王充鄙视祥瑞，实际上是不承认什么“君权神授”。西汉末年以来，统治者往往假托“上天”或“先圣”降下了什么“预言”或“启示”，以此作为欺骗人民和玩弄阴谋诡计的手段。王充戳穿了他们的把戏，对于编造妖言、欺世盗名的一小撮反动家伙，是个有力的打击。

《问孔》对儒家为维护“礼治”而宣扬的“重义轻利”的反动说教也进行了揭露。孔丘妄图用“仁义”的说教，扼杀奴隶生存的基本权利。他回答子贡问政时说：“宁可没有粮食，没有军备，也要保持住奴隶对主子的信赖。”王充质问说：照你的讲法，“信”似乎是最重要的了，但假使治国没有粮食，让老百姓饿肚皮，“信”又从何而立？他推崇法家的重农思想，认为，“去信存食，虽不欲信，信自生矣。”就是说，要把满足人民对于生活的起码要求摆在前边，信才可以立。孔孟和后世反动统治者所谓的“仁政”、“信义”，只不过是强使人民饿死也不准造反罢了。

《问孔》还勾画了孔丘这个大骗子的丑恶脸谱。在王充笔下，孔丘一方面是个东奔西窜，“智穷策困”，“望绝无